

区域经济史研究的佳作

——评《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

焦建华*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区域经济史; 区域标准; 规范研究; 总体评价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422x(2007) 01-0104-05

《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以下简称《区域》)是湖南岳麓书社2004年推出的“南强史学丛书”之一,是厦门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戴一峰先生多年从事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结晶。全书共分五篇:人口迁移与地区社会经济变迁、闽江上游的经济与环境变迁、福建农林业经济、区域城市的发展(厦门)以及商业、商人群体和商贸网络。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近代福建区域内的人口、环境、城市、经济以及区域内经济活动的主体——商人及商人群体——研究,研究的主线始终是在区域的前提下探讨社会经济变迁。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研究功底和学术旨趣。笔者主要对该书的研究框架和思路等问题进行详细探讨和分析。

一、区域选定及研究

我国学界从事区域史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较多从事宏观历史和政治史研究,而较少关注区域史考察,虽偶有学者从事地方史研究,但毕竟不是主流。随着与国外学界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学界逐渐接触到西方学界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尤其是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影响,领略到区域史研究的风采,开始从事区域史研究。^④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汉学界注重区域研究是扬弃了先前强调中西碰撞宏大事件叙事传统的“费正清

模式”,反对历史发展单向聚集的观点,强调“内部取向”和对历史个别化特征的解释。^⑤施坚雅的“经济区域”理论还具有宏观叙事特征,但主要属“内部取向”的区域研究。这种解释框架正好暗合了我国史学界长期动荡后要求转型的大趋势,因而从者甚众。戴一峰先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对区域史研究产生兴趣,同时也受史学名家傅衣凌先生教诲和影响,从而步入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⑥

区域史研究首倡于法国年鉴学派,即所谓“空间史学”,提倡跨越民族国家对人类各种不同文化进行历史考察,扩大历史研究的空间视野,将“空间”纳入考察对象。我国史学界虽然有地方史之传统,但与区域史内涵还是有所差异。区域史研究属跨学科领域,必然要涉及到区域经济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相关领域。“从地方史到区域史的发展,其关键在于空间观及其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建立”,^⑦这首先要涉及区域本身的界定。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经济区域的划分是按照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特点,以及生产专门化程度和发展方向等划分区域。简而言之,区域有大有小,也可大可小,因经济活动的自身特征及其内外联系的程度而不同。虽然不同学科对“区域”有

* [收稿日期] 2006-10-06

不同的界定,但它首先应是一个地理概念,是由地质构造、气候条件、历史基础和现实发展等因素共同形成的一个特定范围,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差异性,特别是自然赋存的不均匀。¹² 经济学一直沿用的是 1922 年苏俄的界定:“所谓区域应该是国家的一个特殊的经济上尽可能完整的地区。这种地区由于自然特点、以往的文化积累和居民及其生产活动能力的结合而成为国民经济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¹³ 这个概念主要是从经济的有机体系,即经济完整性来划分区域。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定义是美国学者胡佛 1970 年的界定:“区域就是对描写、分析、管理、规划或制定政策来说被认为有用的一个地区统一体,它既可以根据内部均质性划界,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结节区。”¹⁴ 另外,胡佛根据区域内组成部分不同特点表现出来的相关性将区域划分为均质区和结节区,前者即内部特征具有一致性,后者则是内部相互关系或共同利益的功能一体化,有一个核和一个互补的外围区;¹⁵“同质区域一般的基础是可输出的共同产品:整个区域作为这样一种过剩产品的输出区,因而它本身的各部分几乎没有理由扩大彼此之间的贸易量。与此相反,对于结节区,区域内部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则至关重要,尤其对于那些只有惟一的中心(区域的中心城市),或许还有一些次一级的中心,以及大片农村地带的区域更是如此。这样的两至三个实行专业分工的有机部分彼此之间相互补充,由内部的转移媒介联结起来。”¹⁶ 施坚雅的区域标准明显受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影响,直接源于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根据实地调查材料对中心地理论的假设进行修正,以河流、山川等自然特征,即地文学特征以及市场系统为标准划分区域,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差异,使原来的“中心地”理论进一步完善和较符合现实。¹⁷ 施坚雅的区域研究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影响了很多中国学者,戴先生无疑也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国内史学界对区域的界定也存在

不同认识,如著名史家杨国桢先生就主张以历史上已有的行政区划作为区域研究的基本标准,¹² 吴承明先生则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决定于自然条件,政治、社会、文化习俗都有作用。而在历史上,各区域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行政区划的制约。但是“从事区域史的研究者,不必胶柱于划分标准,可以从习惯,或大或小,以资料方便为准。大如江南、西北、南北满,小如皖南、苏北、辽东西,皆以习用。从资料利用说,分省立史亦有便处。”¹³ 以上是有关区域界定的简要回顾。戴先生虽然没有与区域界定有关的理论探讨,但他在研究中蕴涵了自己的取舍和界定,分析其研究轨迹可以追寻一二。

首先,戴先生早期选取的区域便是闽江流域,主要研究闽江上游的社会经济(《区域》第二部分)。闽江是福建省内最大河流。上游包括沙溪、富屯溪和建溪三大支流,流域区成扇形展开,地处福建西北一隅,为福建地势最高地带,属大陆性气候,溪流纵横,水量和森林资源都很丰富,形成一个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社会经济区域。自然条件决定了上游地区主要经济活动就是栽培经济作物和采伐山林资源,这也是闽江上游社会经济的总体特征。戴先生主要考察了闽江上游的茶叶、木材、纸张等商品生产及上游区域市场的形成,并综合考察经济发展的各种交通和社会因素,从而完成了对闽江上游的整体社会经济考察。由此可知,作者选定的区域是以流域和山脉等自然特征为标准,即均质性区域,这一区域主要的生产商品是农产品和林产品,本身之间的交换并不太多。应着重指出的是,由于考察自然条件一致性较高的均质性区域,因而作者比较早注意到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特殊环境对经济开发既有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延缓当地开发,二者相伴而生。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断引起世人关注,环境史逐渐成为史学界热点,相关文章和书籍层出不穷,而戴先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就注意到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见其眼光之敏锐。

其次,作者以闽江上游的研究为基础,进而考察近代福建的农业生产规模、技术和林业经

济,主要是林业经济(《区域》第三部分),这也是闽江上游经济的主要特点。区域标准已经转换,以行政区划为标准,即福建全省。行政区划也有其合理性,关键在于考察的资料是否细致完备。作者显然受到了傅衣凌先生的影响,广泛发掘和收集各种官方和民间资料,使用了包括政府部门的调查报告、各种报刊资料、地方史志和民间的各种经济文献等在内的各种资料,某些资料现在已经散佚,因而其资料的丰富程度可能后来学者很难去超越。由于有详实的资料作为支撑,戴先生对福建全省经济的考察也较有说服力。

再次,戴先生考察的闽南区域,主要是中心城市厦门的发展。城市是区域的核心,是区内经济活动和区外经济联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¹⁴戴先生先后探讨了厦门城市的兴起、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城市商业、航运业、工业、金融业以及市政建设等方面,系统完整地考察了厦门作为闽南区域中心的兴起和发展的方方面面,透视出闽南区域的经济特点(《区域》第四部分)。此时区域内涵已再次变换,其标准是经济的内在联系,即结节区:核心是厦门,外围是闽南其他区域。然而,作者仅仅考察了闽南区域的经济中心,而未将视角“内转”。虽然笔者也试图从期刊和网络上搜寻作者其他有关闽南区域的文章,但没有找到,因而闽南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留存大片空白,如区域内部的联系、外围的发展、中心与次中心以及与农村的经济联系、市场形成及体系等多方面内容都未详细展开。以戴先生之学力和识见完全可以详细考察,显然其志不在此,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作者的视角没有“内转”,而是“外转”,转向更大的“区域”。

最后,戴先生考察了“环中国海区域”的跨国区域(《区域》第五部分)。作者并未将区域囿于民族国家疆域内,而是将区域的界定更加放大:跨国区域,将历史上有密切经济联系的跨国地区列入区域研究范畴,因而此时区域更具全球视野。当然,有些学者并不赞同,如郝寿义、安虎森在界定区域时明确指出“必须包括

于某一主权国家的疆域内(有时可能相等)”¹⁵。然而,从历史角度而言,这种跨国区域的考察也许更符合历史实际。闽粤与东南亚及日本的经贸关系尤其密切,可能胜于与中国其他区域的经济联系。此外,跨国区域研究与当前全球化趋势也存在对话的空间和可能。日本学者滨下武志一直提倡“海洋亚洲史”,主张使历史研究从过去以“时间”为主要对象转向以“空间”为主要对象,从海洋角度重新审视和定位近代亚洲,重新构建近代亚洲的历史。这无疑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可以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相媲美。环中国海区域无疑是应该重新研究的区域之一,华人与华侨网络是亚洲地域研究的主体之一,华人网络模式是近代亚洲的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¹⁶戴先生的工作是其中一部分:虽然《区域》从区域活动主体——商人和商人群体——角度收录了部分研究成果,但其背景显然是环中国海区域。戴先生引入了当前比较流行的网络理论¹⁷探讨华商及其经贸关系,将华商网络引入区域史研究,从国际视野角度考察闽南及中国经济与环中国海区域的关系,与滨下武志等日本学者考察的亚洲历史体系及经济圈等理论对话,也从历史角度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理论进行对话,充分体现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前瞻眼光,也充分显示了放大区域、引入网络理论进行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戴先生根据研究的不同需要和相关的资料对区域予以不同的蕴涵,让读者可以充分领略区域史研究的旨趣和意涵。当然,可能有部分学者会责难区域标准的变换,要求能够将标准进行规范和固定,这当然不无道理。然而,“史无定法”,学者在研究时都要根据具体资料而确定具体方法,而不必拘泥于某一僵化的标准和理论,关键在于避免具体研究时标准紊乱。吴承明先生认为“从事区域史的研究者,不必胶柱于划分标准,可以从习惯,或大或小,以资料方便为准”,极力主张和提倡“史无定法”之方法。戴先生的实际研究充分体现了“史无定法”之风采,他在同一研究中都准确理解和把握了预设的区域标准,并始终贯彻之,并

未出现标准的紊乱,因而无需吹毛求疵。

二、从区域研究上升为整体、宏观研究

吴承明先生在经济史研究方法论探讨时提出把握“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和“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之别,认为学者既要注意重视实证研究,也要关注规范研究,不能偏颇,才能推动我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区域研究的实证特征比较明显,因而比较容易陷入个别、特殊的经验事实,个案无法上升为普遍经验,实证研究无法上升为规范研究,导致无法同学术界主流或共同关注的全面、宏观问题进行对话,这是区域研究最忌讳之处,也是区域史研究学者极力避免之处。平心而论,戴先生早期对闽江上游经济问题的研究明显只具有微观研究特征,限于个别经验,拘泥于实证研究,并未上升至规范层面进行探讨,然而已初露规范研究的端倪。如考察闽江上游、近代福建的林业经济即已显示出作者在关注环境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由于处于学术成长期,作者学术功底和识见尚未成熟,因而并未上升为对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戴先生后期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因而有《环境与发展:二十世纪上半期闽西农村的社会经济》¹⁸之佳作问世,这也是作者长期积累和早期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区域》看,作者从1995年后学术研究逐渐走向成熟,非常娴熟地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结合起来,佳作频出。除前面所提的《环境与发展》还有“泰益号”等商人网络的研究,以及对李氏宗亲投资的研究,类似由个案研究上升为普遍经验探讨的文章很多。笔者以戴先生《东南亚华侨在厦门的投资:菲律宾李氏家族个案(20世纪20至30年代)》¹⁹一文简要分析一二。作者通过分析李清泉及其家族在厦门投资的开始、发展及失败整个序列,指出应当把东南亚华侨对中国的投资放到东南亚华侨与家乡关系演进的背景进行考察,认为著名华侨史学者王赓武先生归纳的“先施-永安模式”(纯粹追求利润)和“陈嘉庚模式”(纯粹为家乡需要)不能概括李氏家族投资的内涵,李氏投资

是利润与道义二者的综合并行,相行不悖,这实际上提出了华侨投资中国的第三种模式,即“李清泉模式”,当然作者没有以此命名。由此可见,作者已经非常娴熟地将个案研究与整体讨论结合起来,由个案研究上升为规范研究非常自然与完美,充分体现了区域史研究的深邃和广阔前景。

综合而言,戴先生后期的区域研究既具有实证研究特征,同时也具备规范研究的特征,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而不显生硬。正是由于有坚实的个案等实证研究作基础,戴先生后期除继续个案研究外,学术旨趣显然转向了理论思考,如“环境与发展”、“环中国海贸易圈”等宏观层面的命题。这也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再赘述。

三、总体评价

《区域》一书充分展示了戴先生区域研究的学术历程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先从闽江上游,然后扩展到福建全省,再到闽南区域,最后扩展到环中国海区域,“区域”内涵不断调整,不管是早期对均质区,还是后期对结节区的考察,都准确地把握“区域”理论的精髓,充分展示了作者区域史研究的风采。戴先生关注点始终是社会经济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将社会与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从个别经验的实证研究逐渐上升为普遍经验的规范研究,逐渐走上了与国际学术接轨的道路。其研究成果对今天福建经济的发展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另外,《区域》一书的成功也与戴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分不开,既重视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又注意材料的考订和辨伪,这正是我国传统史学所强调的考据功夫,也是一个知名史家必备之功。如他在研究闽江上游区域时对资料的发掘和应用都达到了较为完美的程度,以后学者可能很难跨越,他综合各方面资料考证华侨人数,最终推测出福建华侨的大致数量,其推算结果也广为华侨史学界接受。

由于戴先生视野开阔,学术旨趣广泛,多方面都有涉足,研究领域虽然统属于区域研究之

下,其实区别已经很大。如果撇开区域这根主线,我们可以看到戴先生显然没有囿于某一区域或领域,而是有诸多变化,研究选题涉及海关史、农业史、城市史、金融史、商业史、华侨史以及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每一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就,每一领域都有所建树,这充分展示了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和广泛的兴趣,不能不让人佩服。然而,这也导致很多富有意义的区域研究领域并未完成,如闽南区域只是研究了区域中心城市,而其他诸多问题只是点及,而未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留下诸多空白。虽然戴先生后来出版《West Fujian Land and Migration 1910s - 1940s》一书²⁰可以看作对闽江上游区域研究的一个总结,门下博硕士也逐渐拓宽和夯实相关领域的研究,但还是存在很多具体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尚未展开,这不能不说是遗憾。

注解与参考文献

¹ 戴一峰:《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岳麓书社,2004年。

^④有关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可参见陈支平:《区域研究的两难抉择》,《中国史研究》2005增刊,该文主要侧重于社会文化方面。

^{④④}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

^{1/4} 见《区域》后记,以后凡是该书的内容不再详列。

^{1/2} 5区域》后记。

^{3/4} 储东涛主编:《区域经济学通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⑧全俄经济区划委员会:《苏联经济区划问题》,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82页。

(七)(美)E. M. 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0年,第188页。

(七)(美)E. M. 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88-189页。

(五)(美)E. M. 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第225-226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本为第176页,翻译略有不同。

¹¹ 关于施坚雅的区域理论可参见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¹² 杨国桢:《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和研究框架的探索》,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31-41页。

¹³ 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¹⁴ 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¹⁵ 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¹⁶ 滨下武志:《东亚世界的地域网络》,东京山川出版社,1999年。

¹⁷ 德国学者首先提出了华商网络的概念,马上得到广泛认同,相关研究也迅速兴起。Murray Weidenbaum, Samuel Hughes: *The Bamboo Network—How Expatria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Creating a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in Asia*. The Free Press, Simon & Schuster Inc. 1996.

¹⁸ 《区域》第271-293页,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¹⁹ 《区域》第54-73页,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²⁰ Leo Douw and Dai Yifeng ed., *West Fujian Land and Migration 1910s - 1940s*.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00.